

大

家

论

学

■ 刘咸炘论史学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蜀文献集成》

刘咸炘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大

家

论

学

■ 刘咸炘论史学 ■

刘咸炘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咸炘论史学 / 刘咸炘著 .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2016.1

(大家论学)

ISBN 978-7-5439-6684-0

I . ① 刘… II . ① 刘… III . ① 史学—中国—古代—文集 IV . ①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0066 号

责任编辑 : 张 树

封面设计 : 许 菲

丛书名 : 大家论学

书 名 : 刘咸炘论史学

刘咸炘 著

出版发行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 200040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昆山市亭林彩印厂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印 张 : 9

字 数 : 222 000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39-6684-0

定 价 :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弁 言

李学勤*

日前听到《大家论学》第一辑的编选整理已经完竣，很快即将付印问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在这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多次垂询我的意见，我也得以从他的讲述中获知这套书的设想，认识到这确实是很具有学术意义的好书，值得向广大读者作一推荐。

《大家论学》是在所谓“国学热”日见升温的当口诞生的。这几年，由于参加《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工作，必须更多查阅学术界的资料，才发现“国学热”在不长的期间，竟已发展到出人意料的局面。仔细想来，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国学”就是“中学”，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随着中国国势走向振兴，人们自然会增加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要求认识、继承和阐扬其中的精华，并将之推向世界。

*李学勤，清华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北宋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常被视为中国学人的最高抱负。这里面“为往圣继绝学”，便可以理解为对传统文化学术的继承和发扬。前人已往，其学已绝，所以“继绝学”不能停留在前人固有的层次上，而是要于其基础上续作提高，日新又新。不过，正确地了解传统，分析传统，究竟是继承而且创新的前提。

这里我们看到学术史的工作是多么重要。事实上，在历史发展中每逢重大转折的时刻，每每有富于远见的学者出现，做出学术史的总结和探究。前人曾指出，战国晚期百家争鸣接近终局之时产生的《庄子·天下篇》，堪称这方面最早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奠基人，应推章太炎与梁启超。章太炎于这方面发轫较早，有关论作虽多，但未成专著。梁启超则在二十年先后撰成《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后一书开首，梁启超说：“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的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又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钱穆先生1937年出版的书，尽管学术观点与梁氏不同，也用了同样的标题。

梁、钱两书都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讲述的学术史，对当时学术界而言恰好符合需要。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总是以其前一时期的学术作为凭借的思想资料，从而有所变革、进步和创新。足知对前一时期学术史的了解，一定会有利于当代学术的前进，甚至应该说是促进学术新



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梁启超到钱穆那个时代的学者而言，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挑战，究其渊源，大都可上溯到清代前后的三百年，无怪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种都不胫而走了。

今天的学人，所处时代已与梁、钱二氏不同。作为我们学术界先行和凭借的，不是清代，而是落幕未久的二十世纪。比之清代，二十世纪的历史更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人物更是群星灿烂，英杰辈出，为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辽阔的用武之地。为了看清当前学术文化的走向，推动新世纪学术文化的建设，不能不重视二十世纪学术的研究。这正是我近些年一直呼吁加强这一时期学术史工作的原因。

实际上，对二十世纪学术的探讨研究，早已在很多学者的倡导支持之下展开了。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展，特别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的学术文化，眼界还有必要进一步拓宽。

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极其丰富多彩，不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例如北京、上海的几处大学和机构。应该说，由于时势机运的流转变迁，很多地方在学术上曾形成学科或思潮的重心，那里的学者在多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成果和贡献。

四川就是这样。自古以来，蜀学有其脉络，虽说蜀道甚难，但蜀地学人影响被于天下。晚清以至民初，情形更是如此，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学人云集，蔚为盛况，于四川文化发展开前所未有的局面。仔细探究四川的学术史传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大家论学》即是如此规划的。这套丛书第一辑即专门编选四川地区卓有建树的学人著作，加以介绍其思想成就的前言，便于读者阅读。现在第一辑所收作者，都是中国学术界公



认的著名学者，无愧“大家”称号。他们大多著作等身，非短时间所能通览。这些选本足以帮助大家了解他们的学术概要，相信一定会博得欢迎。

这套《大家论学》还将继续编印下去，分辑搜集、编辑全国各地二十世纪著名学术大家的专题学术论著精萃，使之成为较为全面反映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成就的窗口。

最后，希望四川学术界当前以二十世纪学者为主，为撰写系统的二十世纪四川的学术史做出准备，将来还可上溯到更早以至古代的蜀地学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贡献就更大了。

2007年12月17日

于北京清华园



前言

胡新农

刘咸炘（1896年11月29日—1932年8月9日）字鉴泉，别号宥斋，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天才学者”，其学术思想及成就在当代已越来越受到中外学者的推崇。

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渊源，借他自己的话说：“吾之学，《论语》所谓学文也。学文者，知之学也。所知者，事物之理也。所从出者，家学祖考槐轩先生，私淑章实斋先生也。槐轩言道，实斋言器。槐轩之言，总于辨先天与后天；实斋之言，总于辨统与类。凡事物之理，无过同与异，知者，知此而已。先天与统同也，后天与类异也。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实斋不知先天，虽亦言统，止明类而已。又止详文史之本体，而略文史之所载。所载广矣，皆人事之异也。吾所究即在此。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而已。实斋名此曰‘史学’，吾则名之曰‘人事学’。其范围详于《一事论》中，而最重者为遗传、土风、时风，要之为气质与风俗而已。”（《宥斋自述》）从宥斋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思想，一是接受了有“川西夫子”之称的刘止唐先生（刘咸炘的祖父）融合儒释道三教的“槐轩之学”的薰陶，二是吸收了大倡“六经皆史”的章学诚先生的新史学观念。这个“接受”

与“吸收”，绝非简单的机械的照单全收，而是主动的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正因如此，也才有了刘咸忻先生自成体系的“推十之学”。而刘先生的“推十之学”，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依然令海内外学者惊讶不已，引人反思：刘咸忻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文化、新思想层出不穷，传统文化备受冲击，西方文化如潮来袭的时代，新与旧，中与外，纠缠在一起，矛盾重重，是故步自封，还是随波逐流？这恐怕是摆在当时学人们面前的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而“天才学者”刘咸忻却有着自己的特立独行，他一方面以非凡的勤奋读解着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中西藏书23000多册，均有批语），沉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学术研究，一方面又非常开放地汲取着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他要“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缔造出具有现代性的中国化的新思想体系”——这就是“推十之学”，一个博大精深的给今人带来深刻思索与丰富启迪的学术思想体系。

刘咸忻先生的治学领域十分广博，而他又明白谈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史学。他说：“吾之学，其对象一言以蔽之，曰史。此学以明事理为目的，观事理必于史。所谓史，不仅指纪传、编年各史，经书亦包括在内。子之言理，亦从史出，周秦诸子，无非史学而已。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显然，刘先生所言之“史学”，与今天教科书上的狭义定义是有区别的。再说明白点，也就是说，要研究刘咸忻先生的史学观，不可囿于狭隘的定义，需将其置于“推十之学”的学术体系中来看待。

刘咸忻先生的《推十书》（增补全本），由“已刊稿”和“未刊稿”两部分组成。《推十书》中的“史学”，又有两种类型的文章。一是史学专著，如《太史公书知意》、《汉书知意》、《后汉书知意》、《史学述林》、《治史绪论》（以上见《推十书》（增补全本）已刊稿）、《双流足征录》、《蜀诵》、《繙史记》、《宋史豫记》、《学史散篇》、《隐士品》、《清学者



谱》、《周官略表》、《汉官表说》、《唐末东南小割据表》、《赵宋四川人文补考》、《赵宋四川世族表》、《赵宋四川长吏表》、《明理学文献录》、《子史篇录》、《讲史裁篇》、《史志土风》、《辟袁公案》、《新辑宋人事迹》、《补四川旧志所略宋人事迹》、《陆氏宋史翼钞》（以上见《推十书》未刊稿）等数十种；二是间及“史学”的论著，如《订韩》，文章主旨在品评韩愈的诗文及为人，间及永贞叔文之乱和《顺宗实录》等颇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其“史识”之敏锐与精辟，足令今人叹服。换一个角度看，刘咸炘先生的史学研究，如史评、史裁考辨、史籍真伪考、历史人物品评钩沉、职官表说、学术史研究、读史方法、金石学等等，涉及广而深，尚需专家学者在《推十书》（增补全本）出版后深入挖掘，编选出更有系统的更为典范的选辑来。

由著名社科文献出版策划专家施维先生策划、组织的《推十书》（增补全本），增补了刘咸炘先生300余万字从未面世的手稿，堪称学术功力与非凡见识结合的典范，十分珍贵，现已被列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书凡800余万字，20巨册。其标点整理工作由刘咸炘先生之子刘伯谷先生与四川师大著名教授黎孟德先生主持。此项整理工作已进行了两年多了，目前已接近尾声，明年将与广大的读者见面。

今限于篇幅及条件所限，姑作是选，以待来者。

2007年9月27日于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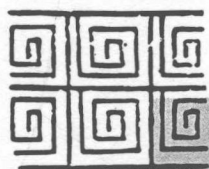


目 录

出版弁言	李学勤 1
前 言	胡新农 1
太史公书知意 (节选)	1
序 论	3
辨真伪	4
明体例	18
挈宗旨	23
较班范	27
汉书知意 (节选)	31
序 论	33
后汉书知意 (节选)	39
序 论	41
论篇体	42
史学述林 (节选)	45
史体论	47
史目论	72



记注论	84
春秋国语论	91
唐史记序驳	97
南北史家传释非	106
通志私议	114
史通驳议	120
宋史学论	174
史学杂论	194
别史考遗	199
史病论	205
华阳国志论	216
重修宋史述意	221
治史绪论	227
序 论	229
史学浅讲	230
治史浅纲	233
读史绪目	243
双流足征录（未刊手稿节选）	253
序 论	255
货殖考	257
蜀诵（未刊手稿节选）	261
弁言	263
绪论	264
蜀刻书藏书考	270



太史公书知意

(希达)



序 论

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者止二法：曰考证、曰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论其事、论其文者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盖史法之不明久矣。《太史公书》人所共读，而前人用功最深者，莫如方苞、梁玉绳。方则藉以明其所谓古文义法，梁则藉以考秦、汉前事迹。二人之说义例，较多于他人。然梁氏止知整齐，方则每失凿幻。盖考据家本不明史体，而古文家又多求之过深。二人之外，皆视此矣。吾既撰《汉书知意》，复究《太史公书》，亦作《知意》六卷，体与《汉书知意》同，偶涉考证、论事、论文，必与义例有关。是书前人议论甚多，故辨驳加详，非不知恣为击难，坐长烦芜，欲明本义，不得不然耳。至于考证家所举字句之讹误，古文家所标章段之神奇，亦不录也。己未年闰七月初稿，己巳年十二月重修，二十三日毕。

治《史公书》须明四义，先总举之。



辨真伪

是书本有缺亡，又经续补。缺亡究为何篇，当审张晏以降之说；续补断自何处，当辨史公作书之年。以是纷纠，论者歧异，梁玉绳考之最详。近人崔适复创异说，今具录之如下。

梁氏《史记志疑》曰：按：史公作史，终于太初，而成于天汉，其歿在征和间。一部《史记》，惟《自序传》后定。其曰至太初而讫者，史作始于太初元年，即以太初终也。曰论次其文，七年遭祸者，明未遭祸以前已为《史记》，至是乃成也。若所称麟止者，取《春秋》绝笔获麟之意也。武帝因获白麟，改号元狩。下及太初四年，凡廿二岁。再及太始二年，凡廿八岁。后三岁而为征和之元。太始二年，更黄金为麟趾褭蹄，盖追纪前瑞焉。而史公借以终其史，假设之辞耳。又曰：七年者，太初元年至天汉三年也。观《报任安书》，史公征和中尚存，其史成于天汉，而实以太初为限。《汉书·迁传·赞》谓史讫天汉。张守节《正义·序》、吴仁杰《刊误补遗》从之，殊失考。史公《高祖功臣表·序》云：至太初。此《传》云汉兴至太初百年。又云至太初而讫。他若《荀纪》、《后书·班彪传》及《史通》《六家篇》、《古今正史篇》。皆云讫太初。即《汉书·叙传》亦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则《迁传》赞辞明属妄谈，盖误以李陵之降为断，复见诸处后人增加之语，遂认史不终太初矣。炘按：梁说详矣。《迁传·赞》当谓



成之年耳，不然，孟坚何健忘如是。

崔适《史记探源》曰：《太史公自序》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包黄帝，下至获麟，犹《春秋》止于获麟也。然则《孝武本纪》当止于元狩元年冬十月获麟，犹《春秋》止于哀十四年春获麟也。是时尚以十月为岁首，元狩之冬，犹《春秋》之春也。年表、世家、列传称是，乃篇末更载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却逾麟止年限二十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末。又逾太初年限十四。《集解》、《索隐》、《正义》皆谓终于天汉，犹介乎其间尔。更较全书，《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且及昭帝元凤间事矣。《楚元王世家》王纯自杀，且载宣帝地节年号矣。《齐悼惠王世家》城阳王嘉、菑川王横卒。《将相名臣表》薛宣为丞相。且载成帝建始、鸿嘉年号矣。此《史通》所谓卫衡、史岑等相次撰续者邪？亦后人据《汉书》窜入邪？太史公所作，自当践其至于麟止之言，今可证成其说者八焉。《自序》引其父谈及壶遂之言，比之于《春秋》。汉时亦有获麟之事，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必不宜舍而逾之，一也；《汉书》公孙弘与卜式、倪宽同传，主父偃与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同传。《史记》止为弘、偃作传。以弘相、偃诛在麟止前故也，后此不为之传。他人姑弗论，若终军者，非《自序》所谓忠臣死义之士，其所欲传者邪？军之对策以获麟，死节在太初，如《史记》讫于太初，何不为军作传？而不为之传，非以至于麟止故邪？二也；《外戚世家》窦姬长男为太子，王夫人生男为太子，卫子夫生男名据。是则景帝、武帝为太子皆不名，独于卫太子名，何邪？未立为太子故也。立据为太子，在元狩元年四月，在获麟后，前此犹是皇子，故名。若讫于太初，安知太子之终废而名之邪？三也；别传终于淮南、衡山王，以其狱在麟止前一月也。